

北洋集团

与晚清政局

□ 马平安 著

清王朝所以灭亡，从统治集团内部考察，显然是因为中央集权体制逐步瓦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地方势力长期侵蚀。其最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资本，利用辛亥革命之机逼宫夺权的结果。北洋集团从组建到问鼎最高政权，只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团体来说，这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

辽海出版社



北洋集团

常州大学
藏 书 章

清政局

马平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 / 马平安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51-1078-4

I. ①北… II. ①马… III. 北洋军阀史 - 研究
IV. ①K25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671 号

责任编辑: 丁 雁
封面设计: 小 宇
责任校对: 李国宽 陈文本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0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 刷 者: 沈阳市浩鸣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7.25

字 数: 4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研究晚清北洋集团的兴起及其从地方走向中央的过程，以此为个案，观察清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一个很好的选题。本书研究了北洋集团的形成、发展、扩张到兴盛，即从地方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到攫取中央政权的经过。以往学者研究北洋集团主要是军事方面，而且主要是以袁世凯为中心，本书则兼及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金融、实业，涉及北洋集团众多人物，多方面、多角度剖析北洋集团的形成过程，说明它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历史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指出了北洋集团是承袭了湘军、淮军的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是甲午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转型的产物；着重分析了清末新政过程中北洋集团在军事、政治、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扩张，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清王朝的权力争夺、权力再分配以及满汉矛盾；分析了清末社会转型中的复杂背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活跃以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等等因素。在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权力冲突的背景下，由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一批朝中重臣差不多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死去，造成清王朝统治层的权力真空，为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条件。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赢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借满洲亲贵为靠山，以新政为名，抓军事，抓政治，抓经济，抓教育，抓警察，各方而都取得了实际成效，造成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尾大不掉之势。虽然在1906年丙午政争中落败，虽然在宣统即位后不过一个月，就被摄政王以袁世凯“患足疾”，加以罢斥，将其逐回河南原籍，完全剥夺了他的军政权力，但是由于他已养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剥夺未能改变他掌控军政权力的实质。武昌起义的爆发，给在洹上村“养足疾”的袁世凯提供了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机会。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极为重大的事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吊诡的事件。

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是近代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外多种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种民族矛盾包括国内满族统治阶级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长期发展不能解决，清政府腐朽颓废，不能随着时代发展改革政治、发展社会经济的结果。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发生辛亥革命的直接的国际背景。甲午战

争和《马关条约》，直接促成了兴中会的发生和发展，也直接促成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辛丑条约》的签订，使革命派进一步认识到大清朝廷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必欲推翻而后快；立宪派寄希望于清廷推行新政，早日实现君主立宪政治，无奈清廷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对立宪的具体时间则一拖再拖，对立宪派的立宪请愿活动也横加干涉和镇压，终于使立宪派也等不得了，并且得出了与革命派早先有关“假立宪”差不多的认识。这时候，全国革命形势形成，武昌革命党人打响起义枪声，一呼百诺，不过一个多月，全国就有十三个省市响应起义，宣布独立。但是北方省区在北洋六镇的直接控制下，大多坐观形势变化。这就给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取得全国最高权力的最佳时机。

最佳时机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掌握和运用这个最佳时机，不是人人都具有这个能力的。正是袁世凯在晚清最后 20 年的政治场中练出了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能力，使他能及时抓住这个时机。慈禧太后的死，等于摘除了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摄政王等等，岂在他的话下。他用又打又拉的手段，操控南北双方，应该说是卓有成效。表面上看，革命派胜利了，辛亥革命胜利了，袁世凯从南京临时参议院、南京临时政府手里接过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实质上，袁世凯解释宣统退位诏书，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清帝的授予。退位诏书说：“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这份诏书，袁世凯副署其末。孙中山等虽然不同意共和政府由清帝委托组织，但也默认了退位诏书。问题就在于：袁世凯掌权的民国初期的政府，究竟是来源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推选，还是来源于清帝临终授予，不同的权力来源解释，构成辛亥革命历史最大的吊诡。再深一层想，难道它不是袁世凯几年后称帝的思想来源吗？

马平安同志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他要我作序。因为手头忙，拖了很久。现在想出了上面几句话，写出来，算是卸责吧。

张海鹏

2006年2月12日

目 录

序	张海鹏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央集权的削弱	12
第一节 清初、中期的中央集权	12
第二节 皇权危机的凸显	22
第三节 二元权力格局的形成	31
第二章 迅速崛起的北洋集团	39
第一节 清室集权产物	39
第二节 与淮系集团的渊源	43
第三节 集团基础的奠定	56
第四节 袁世凯的用人思路	73
第五节 集团内部的职掌	95
第六节 成员的层次与类型	115
第三章 新政时期的扩张	126
第一节 军权的扩张与争夺	126
第二节 巡警的建立及其运作	140
第三节 实业及财政金融的实践	149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举办	159
第五节 在东三省的运作	166
第四章 问鼎中央的尝试	181
第一节 丙午政争	181
第二节 袁瞿恶斗	190
第三节 袁铁之争	195

第四节 载洋驱袁	199
第五章 从地方走向中央	203
第一节 清政府政治资源急剧流失	203
第二节 袁世凯权威地位迅速上升	212
第三节 北洋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	221
结 语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70

导 言

一、北洋集团——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审视点

晚清社会 70 余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清末 10 余年，由于新政的举办，各方面的变化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场“旷古未有之奇变”中，中央权力衰退，地方汉族官僚的力量急速膨胀。军事近代化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是这个时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清末短短 10 余年间，北洋集团即走出了地方，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军事近代化和北洋集团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凸显，逐步破坏了传统政治结构的平衡。新的军事权威的出现形成了对现存国家政权的巨大冲击力，加剧了清王朝皇权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地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种深刻的变化，对清末乃至此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清王朝的灭亡，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显然是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汉人地方势力分权长期发展的结果。

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根据政治学的定义，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应该是指在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统属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内容即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上下统属和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分配。

有史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大体存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种基本模式。中央集权，就是大部分或全部统治权归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其权力由中央政府给予，平时严格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号令，并在中央的监督、控制下行使权力。地方分权，则是以中央集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的权力分配形式与统属关系。通常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独立的权力划分范围，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是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有高度的裁量权及自主性，有较大的独立性，中央对地方不得随意干涉。

按照政治学原理，地方分权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分割性地方分权”和“分工性地方分权”两种。“分割性地方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权力各有独立的施用范围，

地方有高度的自主权与裁量权；而“分工性地方分权”，则又是指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的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地方的某些官员代为行使。从整体上讲，一切治权皆属于中央。中央在层层节制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指挥。替中央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的代理机构而已。依据这种说法，我认为，清初、中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大致可以划归“分工性地方分权”的范围；而清晚期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与清初、中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针对其实质内容，则可以将之划归入“分割性地方分权”的范围。

历史上，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其内部的矛盾。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矛盾主要有二：一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牵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体制的运行，促使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权力资源的再分配。

钱穆认为，中国历朝的皇室变动，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尧、舜禅让，一是汤、武革命。禅让是主动的，你好，让你做。革命是被动的，你不好，让我做。“中国帝皇新统，由东汉以下，不论禅让也好，革命也好，永远落在权相或军人的手里，很少能由社会下层平地拔起而登皇帝宝位的。有之，以前只是汉高祖，以后只是明太祖。”“汉高祖何以能以平民身份一跃而为天子呢？第一是当时东方民众普遍反对秦政权，第二是战国以来，社会大变动，贵族阶级崩溃，平民势力崛起，汉高祖正凭此两大潮流之会合而成功。明太祖又何以能以一平民身份而跃登天子大位呢？这因元朝末年，全国普遍反对蒙古人，而蒙古政府里又极少汉人势力，因此汉人的新政权，自然只有从社会下层跃起了。其余的王朝改易，大体全在政府内部，凭借社会叛乱自生变化。而这些叛乱，则多半为权奸与大军人造机会。”^①事实上，袁世凯集团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入驻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亦是与清末民初全国盛行起来的普遍排满风潮及其袁世凯的权臣与军事权威的有利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能不必须认真考虑和审慎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较好的朝代，其内部政局一般都比较稳定，行政权力运作也都比较正常，中央的政令、军令能够及时上传下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般都维持着“本重枝轻”的格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颠倒过来，出现“本轻枝重”现象，则中央政府的权力、权威一般就会下移，中央政府的政令、军令一般就不会得到顺利地贯彻和执行。当地方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自然向中央问鼎，从而导致国家大乱，甚而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多不胜数。西汉初年，汉高祖分封诸王，建立侯国；一旦地方诸侯力量壮大之日，便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地方势力起兵问鼎之时。东汉末年，皇室衰微，董卓、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地方集团先后而起，最终导致汉祚移姓。东晋八王之乱，导致晋朝灭亡，无须多提。唐代安禄山以范阳为基地而势力坐大，起兵问鼎，导致盛唐从此衰落在先，藩镇割据进而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在后。

^①钱穆著：《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93、94—95 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一个朝代。北宋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宋代处理中央与地方的上下关系开了一个好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因此造成了宋代国家政治的死气沉沉与行政、军事效率的极端低下的状况。在宋代 200 多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中央权威受挫的情况。明代初年，燕王朱棣地方势力膨胀，建文帝削藩失败就被其取而代之。

有清一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满洲权贵与汉人地方势力的关系一直是萦绕着这个朝代的一个中心问题。清初，由于康熙帝较好地处理了三藩割据，收复了台湾的郑经势力，中央权威还能很好地保持。但当西方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以后，以此为契机，清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微妙的变化。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地方集团势力日大，并且开始逐渐影响朝局，从而打破了清代 200 余年来的政治权力格局的稳定。在中外矛盾、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夹缝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奋然崛起。北洋集团在新政时期的迅速膨胀，不仅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而且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吞噬了清朝政权，最终实现了从地方走向中央的目标。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这面镜子是最公正的老师，它为后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把握这一思路，也就能够更好地明了本书以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北洋集团作为一个历史审视点的必要了。

事实上，本书所说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是指承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由于应付内外危机的时机，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下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一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这个北洋派内部的实际情况，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外，目前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一提起北洋派，人们便会立即想到北洋军阀，然而北洋派的内部结构绝非仅由军阀构成，其中还有以北洋为基础的官僚集团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①。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

应当说，北洋集团是清政府卵翼下的产物。但是，这一集团在产生、发展壮大后却并未对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起到什么关键性的补救作用。相反，由于这一集团在国内政坛上的迅速崛起与国家军队的私有化，它倒成为清王朝内部的蛀虫与影响清政权稳定的最大的隐患。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文中说：北洋集团“惟自创生以迄溃败，亘延二十余年，决非偶然事实……但物竞天择，惟适者存，北洋派之兴，必有适于生存

^① [日] 渡边淳：《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企业活动》，《国外中国近代化史研究》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8 页。

之环境，北洋派之败，必有不适于生存之环境。”^①此言一语中的。在开始本书初步的讨论之际，有必要梳理一下思路，以期更清楚地了解北洋集团在清末历史上存在的前因与后果。

北洋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其原因纷繁复杂，大致说来，决定这一集团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二）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和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 200 余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千古变局”出现，王权危机陡增。（三）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四）甲午战争后，淮军失势，李鸿章病逝，淮系军事政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代结束。清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势力来填充。（五）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北洋集团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六）在淮系崩溃以后，是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什么集团崛起，这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与同时期的封建官僚相比，袁世凯密切注视着历史潮流的趋向，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在同侪中胜人一筹，终于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诗词和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头地。”^②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攻坚挫锐，克服困难，逐渐实现了到达权力顶峰的这一目标。可以说，在清末 10 年中，袁世凯的头脑、办事精力和机变手腕确实是其他大官僚所罕能与匹。在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中，袁世凯早就掌握了一支新的具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他有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有善于结交权贵和寻找靠山的能力；他得到了中外势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北洋系这一军事官僚集团的迅速滋长与壮大，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完成了从一隅走向全国、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过程。

清末北洋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军事团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新建陆军时期（1895 年 11 月—1898 年 12 月）；（二）武卫军时期（1898 年 12 月—1902 年初）；（三）北洋常备军时期（1902 年初—1905 年初）；（四）北洋六镇时期（1905 年初—1912 年初）。其官僚团体的发展，脉络也十分的清晰，表现在：（一）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1895 年 11 月—1899 年 12 月）；（二）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1899 年 12 月—1901 年 11 月）；（三）袁世凯督直时期（1901 年 11 月—1907 年 9 月）；（四）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07 年 9 月—1912 年 3 月）。在清末，这个集团势力大时，“东三省、热河、直隶、山东全部，与江苏、河南的大

^①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2 页。

^②龙顾山人辑：《南屋述闻》卷二。

部分”^①尽为其所有。具体说来：

1.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是北洋集团的发轫时期。甲午战争中，淮军基本覆灭，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不复存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急急以练兵为忙，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袁世凯抓住这个珍贵时机，经过上层运动获得了训练新军的特权，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到达天津小站练兵。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他以德国陆军为样板，建立了一支不同于过去任何派别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北洋系由淮军集团中分离出来。袁世凯以小站为基地，以新建陆军为规模，大肆招揽当时的军事、洋务及擅长文案方面的人才，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也就是以这个核心班底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政治资本，北洋集团势力才日渐壮大起来并最终夺取了清王朝的政权。正如曾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的张国淦所说：“新建陆军只七千人，规模并不算大，但其组织甚强，其后势力日张，几乎遍布全国。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如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②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于大清王朝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和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的政策调整已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的生存危机，推进较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实现，就涉及对传统的政治运作秩序、官僚制度、政治参与的固有方式、对社会进行动员的方式等进行变革。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士大夫普遍觉醒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没有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试图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这场救亡运动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及变法领导人决策的错误而悲壮的失败，但这场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段插曲，它对于当时尚处在嫩芽状态中的北洋集团之命运和以后北洋集团能否发展之命运，影响实属巨大。单就对北洋集团的发展来说，这场运动就是继甲午战争后为之提供的第二次兴起壮大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身在小站练兵，而他的心实际上却一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进行角逐。“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③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军事。袁世凯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就这样长期蛰伏在偏僻的小站。时机终于来了，而且恰恰不早不晚，正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紧张阶段暂告过去的时候，这样，袁世凯、徐世昌就有了到北京从事运动关节的时间。袁世凯、徐世昌一到京城，就参与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实际上，他们早就参加了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甚密。正因为有此经历，才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梁举荐，光绪皇帝亲自召见，破格擢升袁世凯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使袁世凯及其团体身价倍增的奇遇。

①刘凤翰：《武卫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编印发行，第799页。

②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维新派产生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变法命运之赌注押于袁世凯军事团体上面的想法与做法。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变法运动的流产，也使袁从此获得了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权臣荣禄的赏识和信任，从而使袁世凯及其团体得以攀龙附凤，进入了中央最高层的视野圈内，为其日后就任山东巡抚、壮大团体势力，奠定了坚实的上层关系基础。

2.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北洋集团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团体。在小站时期，北洋集团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但它还主要是一个军事团体。到了山东以后，袁世凯的官做大了，地位上升了，也有了发展自己势力的固定地盘和可以自由操纵的财权，这样他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广揽人才，招兵买马。除了将山东原有的旧军加以裁汰、整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外，还接受、消化了张之洞数年苦心练就的自强军力量。不仅如此，他又大开幕府，开始招揽省内外各种洋务人才，将山东各地原有的官僚加以裁汰、重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这样，北洋集团就从此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地方团体，成为一个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山东时期是北洋集团迅速发展并取得列强瞩目与接受阶段，也是成为中央政府愈来愈依之为柱石的时期。

3. 袁世凯督直时期是北洋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影响朝政的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本集团肌体之中，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官僚集团势力。在新政中，北洋集团的军事、经济、教育、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北洋门下，一时至于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咸派员考察，籍为取法之资”^①，“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②。北洋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本，并且开始影响朝政，这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4. 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是北洋集团与满洲权贵矛盾激化、斗争激烈时期，也是北洋集团开始与中央政府从私下矛盾发展到公开对抗的时期。北洋集团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满洲亲贵与朝廷的猜忌，他们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力，打击北洋集团的发展。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宣统朝权力出现真空为时机，满洲亲贵罢斥了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北洋集团与满洲亲贵的相对合作关系从此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满汉之间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立宪派集团与朝中权贵的矛盾、革命党与清王朝的矛盾的交织发展与激化，最终催发了辛亥革命。但此时朝廷“神器”已为袁世凯所窃取，北洋集团支持袁世凯压迫革命党，迫使清廷退位，最

^①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北洋官报兼印刷局代绛雪斋书局印，宣统二年夏初版。

^②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三，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终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北洋集团从此从地方走向中央。中国历史上从此进入了一个让人都无法预料政局变化与发展的时代，这就是北洋集团蜕变后的北洋军阀混战时代。

总的说来，北洋集团在清末转型期产生并在慈禧太后的卵翼下得到发展，而这一集团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清末政局更严重的动荡与变化，实际上是加速了清王朝灭亡的步伐。

北洋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对待义和团的态度问题。北洋集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剿拳和洋政策，这对于保全和发展本集团及清政府的最高利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当时及以后时局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 在清末新政时期的作为。新政时期，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将直隶与东三省的新政举办得风风火火。尤其是在天津与直隶各地，袁世凯把军队、警察、实业、教育、自治立宪等诸项事业办得有声有色，使北洋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北洋集团积累了雄厚的政治与军事资本，袁世凯的军事权威的地位也从此确立了起来。北洋集团的迅速膨胀，实际上挖空了清王朝的权力墙角，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剧了清末政局的严重动荡。

3. 逼清廷退位。这恐怕是北洋集团在清末中国历史上写下的最为得意的一笔了。北洋集团的发展引起了满洲亲贵集团的恐慌，他们与北洋集团矛盾的加剧与斗争，最终破坏了北洋集团与清廷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也为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革命派集团发动革命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集团乘机反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清政府曾经“花费很多金钱而且寄予很大信任的陆军”，最后却成了“倾覆清政府的工具”^①，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而仅仅是希望在清帝退位后由他自己来当大总统、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就当时的客观效果来说，清帝退位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也宣告了在中国实行了 2000 余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国从此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有关著作及研究状况述略

鉴于北洋集团在清末军事近代化和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海内外人士很早就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大多侧重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属下个人的活动及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争斗混战，揭露其祸国殃民的罪行，对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即北洋军阀的前身——清末北洋集团形成期的基本情况则探讨得还不够深入、系统与全面。对于北洋军阀前身历史的研究，还留有深入探讨的余地，还有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必要。百年来，涉及北

^① 《陆军上尉欧特白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2 页。

洋集团的有关史料及其一些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北洋集团领袖袁世凯在清末活动的研究情况

1. 中国内地的袁世凯研究。1949年以前，整理、编辑和研究袁世凯并涉及袁世凯在清末活动的资料和成果主要有：1913年袁世凯的幕僚沈祖宪、吴闿生所编的《容庵弟子记》，是为袁世凯所编的年谱，其中记录袁世凯练兵与新政的经过甚详，可供研究北洋集团起源、形成等问题之参考。1937年袁世凯的幕僚沈祖宪又辑录编纂了《养寿园奏议辑要》一书，勾画袁世凯发家脉络甚详，是研究袁世凯早期和在清末活动的主要资料。1935年，上海中央书局发行了《袁氏家书》，也为研究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早期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49年陈伯达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该书适应形势而作，虽然观点鲜明，但不能说是严谨的学术著作。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黎乃涵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虽不是研究袁世凯的专著，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探讨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对袁世凯的研究，长期以来从思想和方法上影响很深。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8年，中国内地发表有关袁世凯的文章二三十篇，有几本小册子，其中青谷、林言椒的《袁世凯》是新中国第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传记。1978年至今，10余年的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了过去30年，尤其是一些专著的出版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资料丰富，论述精辟。侯宜杰的《袁世凯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前者重史实，后者重理论，且有局部突破。这一时期，关于袁世凯的研究著作还有郭剑林、纪能文的《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廖一中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周溯源的《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华腾、苏全有的《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这些书都从比较客观的态度，对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活动作了具有一定意义的评述。尤其是由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而成的《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资料条件。

2. 港台的袁世凯研究。同一时期，港台对袁世凯的史料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1967年，沈云龙主编的《袁世凯史料汇编》，计24册；之后出版的《袁世凯史料续编》又收集了过去陆续出版的有关袁世凯的史料。1970年10月，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了《袁世凯奏折》八辑，比《养寿园奏议》保存了更多更准确的原始史料。另外，台北文海出版社还出版了沈祖宪辑录的《养寿园电稿》、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了《袁世凯传记资料》等。但是，港台关于研究袁世凯的学术成果，相对来说不能算多，主要有1970年台湾出版的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和1975年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的章君谷的《袁世凯传》，1977年刘凤翰的《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等。

3. 国外的袁世凯研究。国外的袁世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前，主要以日本为突出；1949年后，除了日本以外，欧美学者也纷纷加入进来。民国初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1913年就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正传袁世凯》，作者是内藤

顺太郎；另一本是《怪杰袁世凯》，作者是关氏充郎。这两本书对袁世凯没有什么很深的学术研究，只是停留在描述人物的程度，但它们提供的资料，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49年后，国外袁世凯研究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1961年，他在伦敦出版的《袁世凯》，是第一部英文的有关袁世凯的传记。这本书是西方所作的第一部将袁世凯纳入整个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尝试，虽然此书没有多少新资料，但在欧美仍有相当的影响。按照陈志让的思路，取得更进一步成果的是美籍学者麦金农（Mackinnon, Stephen.R）。其主要成果有：1971年出版的《袁世凯在京津：其权力的源泉和支点》（Yuan Shi-kai in Tientsin and Peking: 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his power）；1973年出版的《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的起源》；（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k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1980年出版的《晚清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京津（1901—1908）》（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不论这些学术成果的立场与观点，其研究的角度方法，却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总的说来，有关袁世凯个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袁世凯史料集，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北洋集团其他主要成员在清末活动的学术资料与主要研究成果

清末民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北洋集团是一个军事官僚的组合物。除了其集团首领袁世凯之外，还有徐世昌、周学熙、梁士诒、张一麟、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许多重要成员。关于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周学熙所编的《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叔贞所著的《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小鹏主编的《周学熙传记资料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郝庆元著的《周学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贺培新为徐世昌编的《水竹村人年谱稿》、吴廷燮为段祺瑞撰的《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叶恭绰故吏门生所编的《叶遐庵先生年谱》、凤冈及门弟子所编的《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公孙匄的《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沃丘仲子编的《段祺瑞》（上海世界书店1920年版）、濂江浊物的《段祺瑞秘史》（信史编辑社1923年版）、赵仁卿的《李纯全史》（上海宏文图书馆1920年版）、中人的《王揖唐》（上海通艺编辑社1920年版）、沈云龙的《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何汉文、杜近之的《杨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田胜武、田艳华的《冯国璋全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聂冷的《辫子大帅张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贾熟村的《曹汝霖传》（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都有助于对清末北洋集团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朝变暮幻、五光十色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三）涉及北洋集团在清末活动的学术资料与主要研究成果

据来新夏、莫建来统计，从1949年到1999年，国内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这是就50年来整个北洋军阀史的研究

究而言，清末北洋集团的研究成果会远远的少于上述数目)。^①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称得上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详细、全面、专门记载北洋军阀兴亡历史的著作，不过该书属于史话本，仅可作为研究者的参考之用。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略》一书，简明扼要，虽然只有10多万字，但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于1983年扩编再版，改名为《北洋军阀史稿》）。二书都有一定篇幅涉及北洋集团在清末的活动，是这一时期国内比较出色的成果和著作。另外，1996年朱英著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在第十四章中对袁世凯在晚清时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专门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于开拓研究清末北洋集团的视野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在港台方面，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编印发行）和《武卫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先后问世，代表了港台地区在这一时期对北洋集团早期研究的基本学术水平。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这一时期，大量的资料汇编，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晚清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第十一辑）、杜春和等编的《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下册）、来新夏汇编的《北洋军阀》（五册），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等书也都相继出版问世。这些资料对北洋军阀形成时期的情况多少都有涉及，它们的整理和出版，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同一时期，海外学者对清末时期北洋集团的研究也有所突破。主要有两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1955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所著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本是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Edmund S·K·Fung）所著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这两本书被并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两大力作。尤其是前一本著作，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的情况，对清末北洋集团在军事发展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对于清末北洋集团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实际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不尽如人意。关于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在清末的研究成果，无论就其深度或广度，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加强对北洋军阀前身——北洋集团在清末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开拓与深化北洋军阀史与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研究的新领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本书结构

本书从结构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参见《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2页。

^②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